

长征中的女红军们

□ 邱 然

“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个“难”字，道出了长征的艰难险阻。长征路上，红军女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用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生命极限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革命巾帼英雄的代表。

三千多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数以千计的女红军不畏艰险参加了长征。中央红军中女红军总数为32名，包括干部30名、战士2名，其中27名干部与2名战士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女革命家如蔡畅、康克清、邓颖超、刘英、贺子珍等都在此行列中。她们当时都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1934年，蔡畅和康克清分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邓颖超和刘英则在长征中担任过中央局秘书长，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红二方面军中女红军为20多名。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长征。其中，红六军团有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琼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军。在这支部队中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她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部队。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总数约达3000人，拥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独立团作战部队，先后有2个团参与长征。

红25军中的女红军仅有7名。1934年11月，红25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包括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等7人作为随军护士得到批准跟随红军转移，被称之为“七仙女”。到达陕北时5人幸存。

写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女红军跟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同时她们克服了重重磨难，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写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1933年4月与川军的对战中一战成名。当时，军阀刘汉雄率领的川军一个独立师，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500名奉命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的女

红军遭遇。时任团长张琴秋深知敌强我弱，不可暴露火力，决定智取敌人。她指挥官兵们迅速占领制高点，一枪不发，静等敌人靠近，进入最佳射程时一声令下，女战士们火力全开，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以为遇上红军主力，顿时乱了阵脚。张琴秋趁机率团冲进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一个团的枪支弹药。这场战斗让全川为之大震。女战士们还参与了攻克剑门关的城关，为后续部队开凿爬雪山的“天梯”以及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等战斗。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量最多，但因战斗任务牺牲很大。原本约3000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百人。

中央红军的女红军相对较少，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出发不久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妇女队，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转战环境中，组织上没有给予她们太多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基本一致。康克清曾亲自指挥红军作战，歼灭敌军20余名。在行军中，她经常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贺子珍曾冒着敌机轰炸救护伤员，导致全身中弹17处。

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女红军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在中央红军初次经过马尔康地区时，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就肩负起筹粮工作。为了能让部队吃得上班，她们坚决执行命令，努力筹粮。但国民党在当地进行反共宣传，对土司们威逼利诱，向群众鼓吹红军非常“危险”，称若有红军到来，任何人不得提供帮助，如若违反，军法重处。当地老百姓也不会讲汉语，交流中面临语言障碍。为此，筹粮团只能找懂汉语的生意人当翻译。这时女红军的性别优势起到了作用，当地百姓看到跟随翻译过来的是柔弱的女性，便不那么惧怕了。最终，女红军们不仅宣传了红军的政策，还筹到了不少粮食。

红二方面军的20多名女红军被编入各个部门。其中有的被安排负责筹粮做饭当炊事员，也有从事军需被服工作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第二团的主要任务是后勤保障，保卫后方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运伤员、筹粮运粮等。红25军的7名女护士主要负责照顾伤病员，也负责他们的伙食，她们把饭让给伤病员吃，缺少粮食，就到山上寻找野果、树皮，掺上米糠，给战士们充饥。

医疗救护、照顾伤员。长征途中，女红军往往还担负着在战斗中冒着炮火到一线抢救伤员、将受伤的战士转移到安全地点的任务。红25军的“七仙女”医护小组拥有相对专业的医护知识，对伤员进行医疗救治、包扎治疗等工作，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溶液给伤员消毒，行军途中药品紧缺，一到驻点就想尽办法四处搜集、购买。药品缺乏时就在行军路上采集有药用价值的中草药熬成汤，给伤员清洗伤口、治病。她们日夜轮流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顾，帮助伤员解除伤痛，对吞咽困难的重伤员，就一口一口喂药喂食，挽救了不少红军的生命。其他部队的女红军也负责照顾伤员工作，中央红军的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文艺创作，鼓舞士气。文艺工作是女红军们的长项。长征中涌现出一批有文艺才华的“战地百灵”。李伯钊是红军中的艺术家，长征之初她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按照时间先后随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三过草地，一路行军一路演出，率领红星剧社在战斗间隙给红军战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创作了话剧《干人当红军》，歌曲《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编演了舞蹈《红军舞》等。红军战士们在行军的夜晚宿营时唱起《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我们打垮它！”这些优秀作品鼓舞了士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中央红军的蔡畅，也是长征中的文艺骨干，她常常给战士们讲她在国外留学的经历，甚至还会高唱《马赛曲》。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红色娘子军》主题歌，正是参加长征女红军的生动写照。在这个本来只应属于男性的漫长长征途中，女红军们克服生理上、环境上的困难，在斗争中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从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搞特殊，更不以职位高低谋特殊，始终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自警自律；常常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舍身救护战友。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先驱和榜样。

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

——萍乡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刘 晶 刘 源

萍乡革命烈士陵园坐落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牛形岭，占地面积23亩，由革命烈士纪念碑、无名烈士墓、烈士纪念馆、英烈名录墙、纪念亭和石刻雕塑等组成。萍乡革命烈士陵园是根据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复安源工人的信中提到“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的提议而兴建的。纪念碑高13米，碑身正面镌刻着“萍乡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头是四组展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浮雕，碑座正面是三个石雕花圈，碑座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公元一八四〇年以来，尤其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萍乡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如著名的萍浏醴起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湘赣边区秋收暴动及创建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历次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众多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英名在册者八千一百余人，姓名事迹失考者难以数计，今思先烈勋业，谨立此碑，以垂永久。

中国共产党萍乡市委员会
萍乡市人民政府
公元二〇一九年八月敬立

碑文介绍了从鸦片战争以来，萍乡人民投身革命和建设洪流，不畏强敌、接续奋斗，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斗争。碑文缅怀了革命先烈付出的巨大牺牲、建立的不朽功勋，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行文简朴，感人至深。

团结奋斗，树立旗帜

萍乡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的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成为

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1898年，萍乡煤矿创办，次年株萍铁路修建，安源路矿工人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过着“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的悲惨生活，安源工人也因此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1921年秋，毛泽东带着党的一大决议精神来到安源，深入矿井、锅炉房、矿工食宿处等地考察，并把安源确定为开展工运的重点地区，此后多次根据形势变化来安源考察，制定斗争策略。1922年1月，李立三在此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人觉悟。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有党员6人，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9月初，刘少奇受组织委派来到安源，精心筹备罢工事项。

9月14日凌晨，路矿工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工人们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刘少奇作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英勇无畏地孤身一人和戒严司令、路矿首领开展谈判，万余工人在外声援助威、誓死抗争，他们团结一心，迫使路矿当局于18日签订了维护改善工人权益的13条协议，至此，为期5天的大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胜利的工人斗争。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期，党领导安源工人运用“弯弓待发”的斗争策略，适时调整斗争方式，使得安源工会“巍然独存”，安源也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成为培养和保护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1924年底，安源地委有198名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最大和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党组织。

工农联盟，勇闯新路

1925年9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勾结湘赣两省军阀，包围矿山，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扫射，

血腥镇压工人，制造了九月惨案。面对残酷屠杀，几千名安源工人奔赴各地开展斗争，一些人回乡开展农民运动，还有一些人参加革命军支援北伐，为追求自由平等不懈奋斗、视死如归。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着八七会议精神来到安源，主持召开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策划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安源也成为秋收起义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之一。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1200多名安源工人和萍乡、安福等地农民编入第二团。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萍乡工人农民团结协作、勇往直前，9月12日和16日先后攻克醴陵和浏阳，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浏阳城被敌人包围，伤亡惨重，被迫退往文家市。9月19日，文家市会师后，部队放弃攻打长沙，退往萍乡。9月25日，在萍乡芦溪部队遭到伏击，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9月26日，在萍乡莲花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作出了引兵井冈山的重大决策。从此，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1930年9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萍乡开展扩红筹款，众多萍乡儿女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

开拓创新，敢为人先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秋收起义发生在我们党初创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萍乡儿女浴血奋斗中始终展示出一种义无反顾、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创造了10多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 徐冀宁

法国共产党，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春，根据党的决定，王若飞前往苏联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1924年六七月间，王若飞在莫斯科旁听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拜见了李大钊。1925年4月，根据党的指示，王若飞回到国内、来到上海参加党中央的工作。经过在欧洲的5年多时间，王若飞已经由一名单纯的革命青年成长为一名初具理论水平和革命斗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

草原上播火、铁窗内斗争。1925年4月回国后，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1928年6月至7月，王若飞先后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此后，王若飞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苏联学习、工作了3年多。1931年6月，党决定派王若飞回到西北地区的绥远、宁夏等地开展工作。8月底，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记。9月底，王若飞一路南下抵达了当时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王若飞在归绥、包头等地和时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乌兰夫等人密切配合开展了一系列地下斗争，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11月21日晚，王若飞不幸在包头被捕。在此后约5年半中，王若飞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却没有丝毫动摇立场或丧失斗志，而是在狱中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在绥远监狱，王若飞手不释卷，利用监狱允许的条件读了《论语》《易经》等古书，而且还在陋室中趁看守不注意抓紧写下了《周易批注》《中国农民战争》等狱中文稿，其中《周易批注》令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惊叹不已。除此之外，王若飞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抓住一切机会向狱友们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还关注关心狱友们的生活，赢得了狱友们的敬重。在王若飞的带领下，大家在监狱中进行了争取生活条件改善的斗争，迫使监狱方面对伙食、卫生等进行了改善。在太原陆军监狱，王若飞领导建立了学习小组，团结狱友们进行争取狱中条件改善的绝食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37年4月，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王若飞终于在全民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出狱。

延河畔淬炼、山城中交锋。1937年8月，在全面抗战的隆隆炮火中，出狱不久的王若飞抵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延安期间，王若飞参与了创办理论刊物、动员群众抗战、制定土地政策、建设民主政权等多项工作，写下了《今天如何实现蒙古联合抗日》等诸多重要文章，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重要文件，还曾到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并积极参与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



项全国第一，如1922年2月成立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是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1922年7月创办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最早的经济实体，并发行了铜元票和股票，开始了红色金融事业的最早尝试；1923年修建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第一座工人阶级自己设计建造的工会大厦；1923年开展的“八月整顿”是我党最早的反腐倡廉实践，开创了廉政建设的先河；1924年成立的劳动童子军是最早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1924年12月成立的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是我党创办最早的党校，培养了党员干部，为其他地区党校创办提供了宝贵经验。

王若飞于1943年12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对党科学总结历史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4年初，党中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王若飞由此开始直接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从1944年夏起，王若飞于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斗争，反专制独裁、争和平民主。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的王若飞多次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在谈判桌前同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政治交锋。1945年10月10日，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郑重签字。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王若飞出席政协的会议并参加了政治组的工作，团结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坚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1月底，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王若飞通过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同国民党围绕国民大会等问题继续交锋，留下了“为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正义之音。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坐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在机场给前往送行的周恩来留下了有据可查的人生最后一句话——“一切要为人民打算”。途中，飞机遇雨迷航，终在山西境内的黑茶山坠毁，王若飞不幸遇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他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